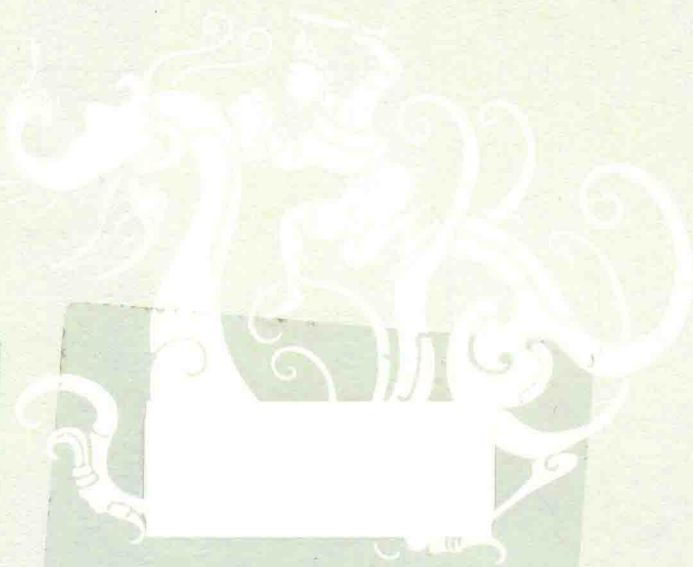


陈舜臣说（史记）  
ものがたり史記

# 帝王业与百姓家

〔日〕陈舜臣 著 黄悦生 译



陈舜臣说《史记》

# 帝王业与百姓家

〔日〕陈舜臣 著 黄悦生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舜臣说《史记》：帝王业与百姓家 / (日) 陈舜臣著；黄悦生译.  
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 7  
ISBN 978-7-5596-0242-8

I. ①陈… II. ①陈… ②黄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—纪传体②  
《史记》—研究 IV. ①K204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50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1-2017-0623号

Copyright @ 2008 by CHIN SHUN SHIN

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(北京)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

## 陈舜臣说《史记》：帝王业与百姓家

作 者：[日]陈舜臣  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  
责任编辑：孙志文  
特约监制：海 莲  
策划编辑：孙宇航 徐 玥  
封面设计：王 鑫  
版式设计：徐 倩  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120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3印张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242-8

定价：39.50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对于很多在昭和时代（1926—1989年）成长起来的日本人来说，陈舜臣和司马辽太郎是两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，“日本历史要看司马辽太郎，中国历史要看陈舜臣”俨然成了一种固定观念，可以说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是建立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之上的，巧合的是，两人既是同窗，亦是挚友。司马辽太郎钟情于解读日本战国时代（1467—1615年）的乱世英雄，他笔下既有叱咤风云的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等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盗贼。他擅长在描述风云人物的同时，表露出自己主观上对人物的解读和对历史的看法。“司马辽太郎”并不是他的本名，他因酷爱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而取此笔名，意为“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”。而公认的“以深厚的学识和透辟的历史观开拓了历史小说新境界”的华裔作家陈舜臣，也将通过细致的笔调，生动地解读《史记》，架起中日历史文化交流的桥梁。

陈舜臣原籍是台湾省台北市，但在日本神户出生，接受汉

学教育，因此不可避免地生存在日本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中。恰巧这段时期中日两国处于战争敌对状态，使得陈舜臣以一个特殊的身份处在“另类”的边缘境地。不过，即便常年对自身认同感到迷惘和困惑，由于受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，他还是考入了大阪外国语学校（今大阪大学外语学院）的印度语专业。

大学期间，陈舜臣接触到了柯南·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，随后在了解了国人受歧视的现状之后，又开始阅读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作品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在学术中找到自我定位，并留校做西南亚洲语言研究所助手。但好景不长，战火最终还是蔓延到日本本土，国籍的转换让陈舜臣不得不暂时回到台湾，在台北初级中学担任英语老师。三年后，他又重新回到神户，并跟随父亲从事贸易工作。

经商之余，陈舜臣读了野村胡堂的作品《钱形平次捕物控》，便萌生了写推理小说的想法，曾以“陈左其”为笔名参与文学界新人奖的征稿，投稿小说《在风之中》最终进入候补阶段，也正因此坚定了继续写作的信心。他于1961年写下长篇推理小说《花叶死亡之日》，获得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，从此正式出道，开启了创作之路。接着，他陆续发表了《三色之家》、《弓之屋》、《愤怒的菩萨》、《分裂者》、《托月之海》等推理作品。从这些早期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窥见陈舜臣卓越的推理能力以及

对人性的洞察。

1967年，陈舜臣的第一部以中国近代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鸦片战争》问世，从此，他的文学创作逐渐转向历史小说。虽然日本很早就有中国历史小说，但大部分都只是以中国历史为素材，内容上更多的是描述日本文化和思想，而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并非如此。他态度严谨，抱有强烈的中国意识，亲自走访史迹，搜集资料，从不假手于人，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，也没有随波逐流、人云亦云的弊病，出版了《曹操》、《三国史秘本》、《太平天国兴亡录》等作品，并在日本长销不衰。

诚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曾说：“没有任何作家像陈舜臣那样，用在不同文化、不同民族夹缝中生存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去深入思考未来。他这样做的出发点自然是研究不同文化、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从事创作活动。”陈舜臣的创作依附的是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历史深刻的认识，从而进一步探索和深化中日两国的文化根源和底蕴。

除了历史小说，陈舜臣在中国史方面也有不少作品，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当属《中国的历史》和《小说十八史略》。前者为通史，讲述了中国自上古至近代的历史进程，后者则是以《十八史略》为蓝本的读史作品。

本书是一部读史的小书。作者以《史记》记载的史实为基础，以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或关键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。在细节

上，例如人物的心理活动、对话、环境描写等，陈舜臣进行了适当的补充，使情节更加完善和细致。同时，他在叙述中融入了自己的个人观点、正史记载、客观现实和考古发现，一方面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，一方面充实了历史知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为了不打断故事的连贯性而未提及或未能展开的项，特地从《中国的历史》（讲谈社文库，1990）中节选了相关内容，以“陈说”的形式进行补充和解释，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。

全书逻辑清晰，杂而不乱，语言平实，通俗易懂，又不失严谨与艺术，可谓雅俗共赏。

在本书结尾，陈舜臣先生写道：“日本人想要了解中国人，阅读《史记》绝对是正道，同时也是一条捷径。因为《史记》里记载了中国人的所有人物典型——确切地说，这些典型并不限于中国人，而是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人。”陈舜臣先生通过对《史记》的通俗化解读，用平静从容的文字，将《史记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细细勾勒，揭示出权利游戏背后的人性规律，让当下的我们在看清历史的同时，加深对人性本身的理解。

所谓历史，记载着一个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，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智慧，更昭示着兴衰更替的客观规律。唐太宗说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镜者，鉴也。鉴往知来，认识过去

才能预测未来。陈舜臣对于《史记》的考究与解读，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波诡云谲的历史变迁，完成对历史的重新审视，获得思想上的警示。这是作者的愿望，也是本书的目的所在。

此外，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表述，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环境、个人阅历有关，或与国内提法有所不同，在此列举部分，予以简单说明：

其一，本书最后一章《史家之绝唱》中写道汉武帝有“太阳王”之称。国内暂无此形容，但据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《后妃传》记载，汉武帝生于汉文帝后七年（公元前157年）六月。母王氏，汉景帝中子。其母王氏在怀孕时，汉景帝尚为太子。王氏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，告诉景帝后，景帝说：“此贵征也。”另外，日本作家伴野朗著有历史小说《太阳王·汉武帝》（中译本2001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而陈舜臣在《致读者》中也说这本书是写给日本读者的，因此，以“太阳王”称汉武帝是可以理解的。

其二，关于司马谈无缘封禅积郁而死的阐述，或许有的读者会产生疑问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写道：“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滞周南，不得与从事，故发愤且卒。”这里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原因，目前国内对司马谈未能参加封禅的原因众说纷纭，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因病滞留周南，



也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因被滞留而“发愤且卒”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引用中井积德之言，司马谈留滞周南，其实是因为汉武帝决意“尽罢诸儒不用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，司马谈确实曾经热心于具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。元鼎四年（公元前113年），他曾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，元鼎五年（公元前112年）又与宽舒议立泰畤坛，但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，在封禅即将进行时“而罢尽诸儒不用”的这种强烈反差下，司马谈痛感失落，悲愤积郁而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其三，作者在《致读者》中提到清朝灭亡于1911年，国内学界对清朝灭亡的确切时间也有所争议，目前有两种观点：一种是以清宣统帝溥仪下诏退位为依据，即1912年2月12日；一种是中华民国成立（1912年1月1日）为依据，即清朝统治到1911年。本书作者采用的即是后者。

其四，由于史料本身的矛盾和解释的差异，关于苏秦、张仪的年辈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说法：一种认为苏秦早于张仪；一种认为苏秦晚于张仪。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所记载二人基本属于同一时代，是战国合纵连横斗争中的对手，苏秦稍早。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却表明：苏秦的年辈比张仪晚，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，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，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身死之后，张仪在秦国任

相时，苏秦还没踏入政坛。因此文中提到的张仪、苏秦去世年份，仅为陈舜臣先生参考《史记》的记载而述写，实际情况仍有待考证。

陈舜臣本人是极为尊重史实和追求细节的，曾多次亲自考证书中出现的地名，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、论述，作出自己的判断，并在书中做出详细说明，力求还原最真实的历史。所以本着尊重陈舜臣创作的原则，并未对书中争议之处作出修改。

## 序 / 《史记》在日本

覃启勋，土家族，1950年出生于湖北省长阳县。历史学博士，专攻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日文化交流史，曾任中国《史记》研究会常务理事，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国学教研室主任、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、湖北智库文化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。

覃教授师从徐中舒、阙勋吾、冯天瑜三位先生，是国内研究《史记》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第一人。他的硕士学位论文《〈史记〉与日本文化》（16万字）曾获湖北省史学会颁发的优秀成果奖，其研究成果被多方引用。

本序为该论文之概要。

关于《史记》是何时传入日本的，在已接触的相关文献中，日本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：其一，池田四郎次郎先生在《史记研究书目解题·关于〈史记〉在我邦的价值》中谈到：“司马迁之《史记》传至我邦是何朝之事，尚不明白。”其二，野口定男先生在《读史记》中指出：“《史记》传至我国，据说为派遣隋使和遣唐使所致。”前者是提出问题，以疑存疑；后者则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一般说法，不能作为定论，且自公元

600年至公元838年，日本共派出十二批遣隋使和遣唐使，将期间的238年作为《史记》始传日本的时间显然不妥，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。

笔者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、甄别后发现，在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之前，日本没有中国的史学，只有中国的经学和佛学。从公元604年起，日本逐渐形成了一股研究《史记》的风气，圣德太子在制定《宪法十七条》时已对其进行了合理地吸收。可见，《史记》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。尔后历朝《史记》续传日本的情况虽于史无载，但据日本著名学者大庭脩先生所著《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·资料篇》散列的数目统计，该时期传入日本的《史记》及相关汉籍数量：凡260部、3012套、5047本。因此，日本江户时代，即我国明、清之际是《史记》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。

《史记》传入日本以后，对日本的政治、教育、史学、文学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**政治方面。**《史记》所蕴涵的“大一统”思想和儒学义理直接适应了建立日本皇室统一政治、调整当时复杂的政治矛盾的需要，被圣德太子直接引入了《宪法十七条》。同时，受“天人感应”学说的影响，圣德太子首次将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的“天皇”一词移植给了推古女王，此后，历代天皇成了人格化的神，

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。

此外，据《正斋书籍考》、《三代实录》、《日本纪略》以及《扶桑略记》等史书记载，推古以后的历代天皇都非常重视《史记》的阅读和研究。例如明治天皇就特别喜爱《史记》——明治十年，他在东京城的住所中，作为日课之一，凡逢二、七之日，专修《史记》，所用课本乃鹤牧版之《史记评林》。除此以外，日本朝廷培养“传生”专攻《史记》等“三史”，并将《史记》下赐府库，以供政府官员研究，使他们理解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深刻义理，以辅助朝廷治理日本社会。

**教育方面。**《史记》传入日本后，在宫廷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圣德太子能够参考《史记》等儒家经典制定《宪法十七条》，与当时皇室将《史记》作为宫廷教科书密不可分。到了奈良、平安时代，据《拾芥抄》记载，吉备真备自唐回到日本后，不仅专设“三史柜”（“三史”为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），并招收学生专授“三史”。得益于此，日本很多官员不仅能够理解《史记》的深邃儒学义理，而且能够以其为题材咏诗作赋。

除了宫廷教育，《史记》在日本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即便到了近现代，也是日本汉学教育的重要教材。例如，据泷川君山（资言）博士《史记总论》记载：“维新之后，朝廷讲筵用《史记》，盖仍古例也。”池田四郎次郎先

生也曾指出：“明治、昭和时代，从大学到中学，往往以《史记》为课本，教材的需求与日俱增。”又如，明治书院于昭和五十六年（1981年）10月10日发行了大矢武师和濑户仁先生主编的《高等学校古典（古文、汉文）指导的理论和实践》，该书收录了井上正先生所著《〈史记〉的指导》一文，该文指出：“如果论及汉文，《史记》是‘经子类’（思想教材）、‘诗文类’（文学类）最合适的。”也就是说，明治以后，日本的《史记》教育具有普遍性，究其原因，除了历史渊源和皇室传统以外，更重要的需要借助儒学证明“天皇政权”的合法性，同时《史记》各个篇章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当时培养人才具有指导意义。

**史学和文学方面。**《史记》传入日本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，在此之前，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和史学。日本第一部国史《古事记》、第二部国史《日本书纪》先后于公元712年、720年完成，这两部史书虽然都是编年体例，但都直接受到了《史记》的影响。比如：均以神话传说开篇；记史以国君为中心；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。

《史记》对日本的“记纪文学”，即以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这一点，从二者的体裁、文字符号（汉字）、叙事抒情风格，以及神话故事等方面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。此外，“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”《源氏物语》以及日本汉诗也渗透着《史记》的种种影响。

《史记》体大思精，对日本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，由此日本逐步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《史记》专门研究队伍。据笔者在有限条件下的了解，就日本近现代而言，颇有影响力的《史记》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、水泽利忠、宫崎市定、野口定男、加地伸行、池田四郎次郎、池田英雄等一百多位。在研究《史记》的事业中，日本学者们展现了密切配合、扎实认真、勇于献身等可贵精神。

纵观日本学界研究《史记》的历史，可发现三个特点：

**第一，重视《史记》的和译。**据史料记载，著名僧人兼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（1469—1487年）所抄《史记桃源抄》，凡十九卷，系日本最早的“国字解”《史记》。塚本哲三著《对译史记》，该书系原文与译文对举的形式，阅读方便，其注释以明代凌稚隆《史记评林》为底本，同时参酌了清人梁玉绳的《史记志疑》和中井履轩的《史记雕题》。据统计，日本的《史记》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。诸多和译本为广大不通汉语的日本民众学习《史记》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**第二，突出人物传记。**例如，野口定男的《读〈史记〉》第一部分三篇学术论文为“总论”性质，第二、三部分凡论文十二篇，论述传记人物的有十一篇。日本学界之所以突出人物传记，是为了探求以大小人物为中心点辐射开来的纷繁历史现象之实质。

第三，长于资料的汇集。日本学者在汇集《史记》研究资料过程中所表现的韧性和毅力简直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，比如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父子共著的《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》一书，规模宏大、体例专精、涉猎广博、收书殷富，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。这不仅能拓宽日本《史记》研究深度的苗进和领域，也能促进我国《史记》研究水平的提高，并有助于与日本同行开展学术交流，相互切磋，取长补短。



收藏于日本山形县市立米泽图书馆的  
《史记桃源抄》（四册）



# 【目 录】

导 读

I

序《史记》在日本

VIII

被饿死的理想主义者

〇〇一

从流亡公子到一代霸主

〇一五

热血传奇之吴越春秋

〇二九

功成身退的商圣之道

〇四九

战国「愤青」的悲剧人生

〇五七

鬼谷先生的学生们

〇七七

奇货中的奇货

〇八五